

# 人文版《袁水拍詩歌選》梳考\*

袁洪權

[提 要] 文革結束後,詩人袁水拍的邊緣化和主流文學界對他的排斥,源於對“四人幫”的政治清算。朋友有對他表達出鄙棄之舉動,亦是特殊環境下的自我保護。1979 年 9 月,臧克家編選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率先剔除了此前選入的袁水拍詩作四首,與 1950 年代編選時的態度截然相反。1982 年 10 月,袁水拍孤寂離世,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出版袁水拍的詩歌選集,形塑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特別是新詩)歷史中的地位。1985 年 7 月,《袁水拍詩歌選》出版,編選者為徐遲、袁鷹,封面裝幀設計為郁風、丁聰、華君武畫了“插圖”。徐遲、袁鷹分別寫了《序》和《後記》,表達對袁水拍的複雜情感,牽扯出《袁水拍詩歌選》編選背後複雜的歷史細節,為研究界反觀 1980 年代初期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提供了特殊的標本。

[關鍵詞] 臧克家 《中國新詩選(1919-1949)》 徐遲 袁鷹 《袁水拍詩歌選》 編選

[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147 - 11

袁水拍(1916.3.28~1982.10.29),江蘇吳縣(今屬蘇州)人,原名袁光楣,他最響亮的筆名是“馬凡陀”,以此為筆名出版的《馬凡陀的山歌》及其續編,給他帶來了巨大的聲譽。1949 年 7 月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茅盾作關於國統區文學運動的總結報告《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重點提到《馬凡陀的山歌》“嚴正地分析了反動統治的實質”,“在風格上一致地表現著一種新的傾向,那就是打破了五四傳統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與大眾化的方向發展”。<sup>①</sup>王瑤、丁易和劉綬松在 1950 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修史<sup>②</sup>、“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sup>③</sup>的制定中,均把它列為國統區政治諷刺詩的經典之作。但 1976 年 10 月之後,袁水拍的名字卻在中國新詩的歷史敘述中成為尷尬,甚至一度成為眾矢之的。1976 年 11 月 29 日,何其芳在給馬識途的信中這樣說道:

這幾年,老實說,我不大感到,在北京有個什麼文藝界。尤其是不覺得有什麼文學界。被承認的文學家的有幾個人? xx。xxx。還有xx。也許還有半個xxx。——是的,我還忘了有個xxx,但他已不是作家了,詩人了,而是副部長了。聽說他的精力用於給江青寫黑信太多,寫了二三十封,有些不知是什麼內容的信,既不敢投郵,又不敢交通信員送,甚

\* 本文係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紅色文藝史料整理、改編傳播與功能價值研究”(項目號:18JJD770004)、教育部重大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整理與研究”(項目號:19JZD037)的階段性成果。

至他自己坐汽車送都不敢,卻要放著專車不坐,一個人辛辛苦苦地騎腳踏車,遠遠地騎到釣魚台去送。這樣,就詩也寫不出了,文也寫不出來了。而且過和他類似的精神生活的人,大概是無法寫詩,世界上好像也還沒有那樣的詩人。世界上也真是什麼怪事都有。但這樣三四個人就成一個界嗎?”<sup>④</sup>

考慮到特定的政治語境,信劄中的人名用“××”或“×××”加以替代,其實都是有所指的,針對的是倒向此前的“主流文學”的文人,包括浩然等。其中,被何其芳提及的第四個“×××”指的是袁水拍。他曾在文革後期的1976年3月(一說2月)至10月間,擔任過文化部副部長、《人民文學》主編,1977年初被解職。這一經歷導致袁水拍受到政治清理,他被當作是“四人幫”的幫派文人。劉錫成也注意到袁水拍的尷尬處境,“隨著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深入,發現袁水拍與‘四人幫’的瓜葛太多了,陷得太深了……”<sup>⑤</sup>1977年12月28至31日,《人民文學》編輯部組織召開深入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座談會,茅盾對袁水拍加以批判:“當時‘四人幫’篡黨奪權,要把他們的一個人塞進去,這個人大家都知道,叫袁水拍。他同‘四人幫’的關係很密切,效忠信不曉得寫了多少封,所以這個人得到‘四人幫’的欣賞。”<sup>⑥</sup>

對於袁水拍這樣一位(甚至是一類)與政治有複雜糾葛的文人,如何給予恰當的文學史評價,是1976年後現代文學研究界頗為謹慎的事。從當前學界的關注可見,關於袁水拍的研究至今沒有真正展開起來,內中原因就在於他的政治生涯同“四人幫”的關係。據韓麗梅統計,1976年2月在《紅旗》發表《鼓舞我們戰鬥的宏偉詩篇——學習毛主席詞二首》後,袁水拍在國內文壇消失了長達六年之久,直至1982年3月10日組詩《漢俳學步》由《詩刊》刊出。1982年10月29日去世前,他僅有三篇文章獲得國內發表的機會。<sup>⑦</sup>本文以臧克家《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三版的刪詩行為、1984年徐遲和袁鷹編詩過程為中介,努力還原《袁水拍詩歌選》編書與出書的歷史細節,為1980年代中國思想與文化史研究做一個微觀的個案標本。

## 一、《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三版(1979年)的處置策略

1953年夏天,中國青年出版社委託臧克家編選《中國新詩選(1919-1949)》,是“為了幫助為青年讀者豐富文學知識,了解五四以來中國新詩發展和成就的概況”。<sup>⑧</sup>初版選錄詩人26人的92首詩作,定價一元七角。袁水拍的詩歌入選4首,包括《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發票貼在印花上》、《大膽老面皮》和《在一個黎明》。

敘述國統區的政治諷刺詩的時候,臧克家把袁水拍的詩歌納入新詩史的敘述框架。他認為“在蔣管區,政治諷刺詩,成為一九四五年以後的詩的主流,每一個詩人都在自己的詩裡發出了憤怒和反抗的強烈情感。這些諷刺詩,不是一般涵義的‘諷刺’,實際上就是‘暴露’和‘打擊’的代名詞”,並提出:

《馬凡陀的山歌》就是這樣一些作品裡代表性較強的一種。他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利用山歌的形式,對於蔣介石及其主子美帝國主義分子進行了有力的諷刺,在青年知識分子和市民層中間發生相當大的影響。由於它的內容富於現實性和鬥爭性,而形式又比較通俗,所以,在許多群眾集會的場合,常拿它做朗誦的材料,有些詩歌如《丈夫去當兵》、《發票貼在印花上》、《大膽老面皮》等,得到了普遍的流傳。在這些山歌裡也還有為數甚少的一部分脫不掉革命小資產階級的情調,表現得還不夠深刻有力。

抗戰以後,袁水拍寫了不少鼓舞人民、保衛祖國和反映人民抗戰時期生活情況的詩

篇,《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就是為人所知的比較優秀的作品。《馬凡陀的山歌》和這些作品比較起來,不論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都不相同,它比那些作品的政治性加強了,在表現方面,更顯得樸素、平易、深入淺出。《馬凡陀的山歌》所以比他以前的作品更受到群眾的歡迎,在政治鬥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sup>⑨</sup>

在編選者臧克家看來,袁水拍的詩歌是 1945 年後國統區諷刺詩的“代表作”。他還讚揚《馬凡陀的山歌》在藝術形式上的特殊貢獻,“打破了一版新詩的習用形式,採取了民歌、歌謠、五七言的形式和格調,這種形式和格調,容易懂,容易上口,為廣大人民,特別是一般市民所喜聞樂見”。<sup>⑩</sup>1957 年 3 月《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二版出版時,袁水拍的詩歌史敘述仍遵照初版的代序文字,入選篇目也未改動。1979 年 9 月推出第三版這一新版時,臧克家在《新版後記》中特別交待,《中國新詩選(1919-1949)》“也作了一些新的調整”。<sup>⑪</sup>第三版與第二版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是代序文字的再修訂與部分詩人的詩歌史陳述變化甚大;二是入選詩人的變化與詩作入選的增刪問題”。<sup>⑫</sup>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臧克家對袁水拍態度的重大變化。

新版裡,臧克家對袁水拍的詩歌進行徹底刪除,這是目錄最醒目的修改。具體文字上的變動則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關於國統區諷刺詩的敘述,新版序言文字的變動。此前第二版(1957 年 3 月)並沒有“發生了較大影響的,有《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寶貝兒》、《生命的零度》等諷刺詩集”這樣的文字,這算是在新的政治語境下臧克家關於戰後國統區諷刺詩敘述的改動,有敘述人物(從袁水拍到臧克家)過渡之考慮(進一步凸顯臧克家在 1945 年後詩壇的位置)。按照 1950 年 5 月教育部定《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來看,“七月派”文人的綠原是不能涉及的,他是胡風分子,1955 年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成員,此時還沒平反。袁水拍也受到詬病,儘管臧克家在《人民文學》、《詩刊》和《文藝報》三家刊物的編委會聯席會議(1978 年 10 月 20~25 日)上說“我對童懷周心裡抱愧。(《詩刊》編輯部)編輯不敢為天下先。到了立於不敗之地時,才敢發表。這是很不好的”<sup>⑬</sup>這樣的話,但在實際編輯新詩選時,他也保持著頗為謹慎的態度,試圖撇清新版詩選可能帶來的政治糾纏。二是在《“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代序中,臧克家刪除了初版、二版對袁水拍論述的文字,整整兩大段近四千字。

刪除袁水拍詩後,臧克家為了補救 1945 年後國統區諷刺詩的歷史敘述,必然要用新的政治諷刺詩來加以取代,使之符合 1954~1955 年編選時對中國新詩歷史的“構想”。他對自己的詩歌篇目進行了調整,用《生命的零度》取代《老哥哥》。《老哥哥》創作於 1932 年 3 月,是其早期詩歌的代表作,表達作者“對黑暗現實的憤慨”,<sup>⑭</sup>他還在散文創作中以同題寫作這位“老哥哥”。《生命的零度》創作於 1947 年 2 月,屬於典型的國統區詩歌,也是臧克家自認的諷刺詩代表作,曾列入 1954 年 1 月作家出版社、1956 年 11 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臧克家詩選》。這種替換的微妙變化,悄悄地實現了臧克家的目標:一是讓政治諷刺詩在特定歷史脈絡中得到接續,與此前的新詩史構想形成內在的統一;二是使自己的詩歌地位得以鞏固,從 1930 年代的新詩延展到 1940 年代的新詩。要知道,在 1976 年 10 月後,臧克家亦面臨很大的政治壓力。他參與復刊的《詩刊》的編務工作過程中,少不了與“四人幫”有類似的歷史糾葛。<sup>⑮</sup>

1976 至 1978 年的政治形勢下,在《中國新詩選(1919-1949)》新版編選過程中,臧克家進行的“新的調整”,切合時代語境和個人的自我申辯,也是詩人的自我保護策略,作為歷史細節的處置策略無可厚非。但是,閱讀《臧克家全集》收錄的懷念故人文章(老舍、郭沫若、王統照、何其芳、王瑩、茅盾、鄭振鐸、曹靖華、高士其、冰心、顧頡剛、季羨林、白壽彝、鄧廣銘、葉聖陶、李廣田、駱賓基、吳伯

簫、碧野、李健吾等),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其中並沒有臧克家懷念袁水拍的文章。從袁水拍在懷念老友的名單中缺席這一事實,可見臧克家的政治敏感度還是太高。如果結合此前此後臧克家與姚雪垠、劉再復的文學論爭,似乎可以理解臧克家的這一行為,但還是給人一種怪異之感。

## 二、袁水拍去世後的兩則材料及其附帶發現

1979年8月17日,袁水拍的妻子朱雲珍離世。這是袁水拍隔離審查八個月後<sup>16</sup>遭遇的第一件大事。熟悉袁水拍的人都知道,朱雲珍的去世給晚年袁水拍的生活增添了無盡的痛苦。<sup>17</sup>目前尚無資料披露,袁水拍有沒有讀過《中國新詩選(1919-1949)》的第三版內容(第一版和第二版他是肯定讀過的),他讀過之後又有什麼感想。晚年袁水拍,一面遭遇同輩人的“多所詬病,不屑往來”,一面“自己更覺難見故人,封閉起來”,“蟄居家中,悔恨苦悶,精神極度壓抑”。<sup>18</sup>1982年10月29日,袁水拍因病醫治無效離開人世。

袁水拍去世後,其掛靠的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立“袁水拍同志治喪小組”,1982年11月4日曾發布過一則訃告:“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人員、著名詩人、中共黨員袁水拍同志因患肺間質纖維化病,經友誼醫院久治無效,於十月二十九日晨七時四十分逝世,終年六十六歲。定於十一月十日上午十時半,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向遺體告別,不舉行追悼會。”<sup>19</sup>訃告特別強調袁水拍遺體告別中“不舉行追悼會”這一儀式,對於一個失意的政治家、落魄的詩人意味著什麼,明眼人自可理解。香港《明報》轉載中國新聞社的“北京電訊”,用很短的篇幅報道袁水拍的死訊,<sup>20</sup>通告其海外友人。1982年12月10日,《詩刊》第12期報道了袁水拍去世的消息:

### 詩人袁水拍同志逝世

著名詩人袁水拍同志因患肺間質纖維化病,醫治無效,於10月29日在京逝世,終年66歲。

袁水拍同志在1944年到1948年曾用馬凡陀的筆名,發表了300多首政治諷刺詩,結集為《馬凡陀的山歌》、《馬凡陀山歌續集》。他的作品還有:抒情詩集《人民》(1940年)、《冬天,冬天》(1942年)、《向日葵》(1943年)、《沸騰的歲月》(1947年)、《解放山歌》(1949年)、《詩四十首》(1954年)、《歌頌與詛咒》(1958年)、《煤煙和鳥》(1958年)、《春鶯頌》(1959年)和政治諷刺詩集《政治諷刺詩》(1964年);詩和通訊集《華沙北京維也納》(1953年);論文集《文藝劄記》(1959年)、《詩論集》(1958年)。譯作有:詩集《五十朵番紅花》(1954年)、《伐木者醒來吧!》(1958年)、《我的心呀在高原》、《旗手》、《土耳其詩選》、《哈羅爾德的旅行及其他》、《新的歌》;論文集《馬克思主義與詩歌》(1950年)、《詩與評論》、《現代美國詩歌》、《論詩歌源流》等,與他人合譯的作品有《聶魯達詩文集》、《巴黎的陷落》等。

這是《詩刊》代表官方對他的文學定位和歷史評價。從標題可看出,官方對他的政治定性(或政治判斷)有一定程度的鬆動。通稿中“著名詩人”、“同志”兩個詞背後深藏的特殊含義,還是能夠讓人捕捉到細節的信息。儘管通稿中省略了袁水拍諸多的政治生涯描述,真正的生平文字介紹不足40字(消息的第一段),但能夠詳細地羅列出他出版過的所有作品集(詩集、論文集和譯作),說明官方對他的文學限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鬆動”,亦看重他在中國新詩歷史上的地位與貢獻。《詩刊》編輯部亦編排了袁水拍的遺詩一首(《煙囪自吹》),隨同這則消息刊載,表達對他特殊的悼念情感。

隨著袁水拍的去世,蓋棺定論對詩人來說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1976年10月後,中國現代文

學史修史中產生最大影響的著作，莫過於三卷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此書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唐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嚴家炎（北京大學中文系）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第三卷（冊）第二十章為“國統區文學”，其中第三節標題為《〈馬凡陀的山歌〉等詩歌和雜文、散文》。在這一節內，袁水拍被予以重點敘述，佔據八頁的篇幅，可見袁水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建構中的重要性。但在作品選的配套資料《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sup>②</sup>的“新詩選”三卷內，並沒有出現袁水拍，這又讓人明顯感到，此時有關袁水拍詩歌的編選仍是敏感而矛盾的：既要讓中國現代文學史呈現出袁水拍的文學史地位，又不能讓讀者看到他的具體詩歌作品。

既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脈絡中要有袁水拍的敘述空間，出版他的作品（詩）選應是遲早的事情。人民文學出版社很快意識到這個問題，做出編選《袁水拍詩歌選》的決定。按照徐遲的說法，是“一些老同志的委託”。<sup>③</sup>這些老同志到底是誰，至今沒有材料披露。但真正要來實際編選袁水拍的詩文時，卻面臨尷尬，還是呈現出某種政治的壓力。找誰來編袁水拍的詩選，是很棘手的事情。如前文所述，連知根知底的老熟人如臧克家都極力回避（新詩史敘述），在《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三版中刪除袁水拍的詩歌，教育部委託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亦故意回避袁水拍詩歌。“舊日好友幾無往還，甚至有斷席絕交者”。<sup>④</sup>按相關信息所示，袁水拍的子女（袁剛健、袁懷雨）都不在文化界，<sup>⑤</sup>他們參與作品集編選的可能性不大。而在老朋友中，與袁水拍交往密切的人，除臧克家外，還有徐遲、袁鷹、丁聰、馮亦代、郁風等人。這些老友能否從同時代人的政治觀念上轉身走出來，參與《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呢？

1985年7月，《袁水拍詩歌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初版分精、平裝本兩種版式，合計印數10,580冊。<sup>⑥</sup>這對於袁水拍這樣的詩人的作品集來說，其實是蠻不錯的印數，“這是對水拍的最有價值的紀念”。<sup>⑦</sup>1986年1月6日《人民日報》第八版對《袁水拍詩歌選》的出版發表了推介語：

#### 袁水拍詩歌選

袁水拍同志是我國詩壇上一位著名的詩人，在詩歌創作上作出過重大的貢獻，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他的詩歌早在三十年代就蜚聲文壇。1944年到1948年間，他在國民黨統治區所寫的大量的政治諷刺詩，是用的馬凡陀的筆名。其《馬凡陀山歌》採用我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歌、民謠以及五七言詩的形式，廣泛而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歷史時期反動統治者內部極端混亂和廣大人民饑寒交迫的狀況。作者以火熱、犀利的筆觸，辛辣地嘲諷了國民黨官僚階層利欲熏心、昏庸無能和崇洋媚外的惡性面目，活畫出一幅黑暗、落後的舊中國的官場現形記。其代表篇章如：《發票貼在印花上》、《四不象》、《凡爾賽的槍彈》等，都是絕妙的好詩歌。

人民文學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袁水拍詩歌選》是從作者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五十年間出版的十餘部詩集和未及結集成書的詩稿中廣搜博求，仔細篩選的選集，共收入詩作二百餘首。包括情詩、山歌、政治諷刺詩三部分。作者善於把尖銳的諷刺與幽默的嘲弄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使作品具有濃烈的時代感和獨特的藝術魅力。他擅長以活而美的口語入詩，不雕飾詞藻，詩句通暢，幽默辛辣，耐人尋味，給人以美感和啟迪。

書前附有作者的生活照片和手跡多幅，並收有徐遲同志寫的序文；書後附有袁鷹同志寫的后記。序文和后記以飽含深厚的情感，真摯的筆觸，精辟地概括了袁水拍同志一生坎坷的經歷及其詩歌創作的成就和特點，表達了對袁水拍同志深切的懷念之情，可說是知音之論。（劉蘭英）<sup>⑧</sup>

從 1982 年病逝後的不到 40 字的生平介紹,到 1985 年出版詩歌選後的隆重介紹,近三年的時間裡,對袁水拍的文學評價已經有較大的鬆動。關於袁水拍文學史評價的鬆動時間,實際上還可往前追溯。徐遲為《袁水拍詩歌選》寫的序言《談袁水拍的詩歌》,1984 年 4 月 6 日完成,先發表在 1984 年 11 月 10 日的《讀書》雜誌上。當然,這也可以理解為是為《袁水拍詩歌選》的出版宣傳造勢。但發表於《讀書》這個思想敏銳的期刊,也並不是偶然的安排。

### 三、徐遲、袁鷹關於《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細節

人民文學出版社最初打算安排由劉嵐山、袁鷹進行編輯,他們本為袁水拍的老舊和同事,且都生活在北京,著手詩歌選的編選工作較為便利。因劉嵐山患癌症還處於治療階段,後改為由徐遲、袁鷹編選。<sup>②</sup>“老同志們”最初不考慮徐遲參與與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是有現實原因的。一方面,是因為徐遲主要生活在武漢;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徐遲和袁水拍曾經斷交。據馮亦代透露,徐遲到北京“只找我和袁水拍,那時還有‘文革’的遺風,朋友們不敢往來,更不能暢所欲言,他一向總認為他的朋友中第一是袁水拍,第二就算馮亦代了”。但徐遲還是在 1976 年與袁水拍斷交,“因為他認為受了袁水拍的侮辱”。<sup>③</sup>但正如邵燕祥所觀察到的,“徐遲是十分篤於友情的”。<sup>④</sup>徐遲毅然承擔起《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任務,從序言文字來看,他在 1984 年 4 月 6 日前已將詩歌篇目編選完畢。序言中,徐遲談及其在編選過程中的情感:

關於這個編輯工作,原先想把他的自由詩、山歌和譯詩合起來編選一大本的。但數量過多,只得把譯詩分出去,也許將來可以另編一本譯詩集。他解放前出的詩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騰的歲月》和頗有影響的《馬凡陀山歌》、《解放山歌》等共出了七本。其中還另有一本《詩四十首》,則是他解放前那些詩歌的自選集,正好成了我這個選本的一個藍本。那本自選集,選得太苛了些,許多好詩並未選入,因此我將它擴大了。共選進了一百三十首,說起來也還是相當苛刻的。開國以後,他的詩集有六本之多。它們是《春鶯集》、《華沙·北京·維也納》、《歌頌和詛咒》和《馬凡陀的山歌》的自選本(它也是我選山歌時的一個藍本),還有《政治諷刺詩》、《煤煙和鳥》,加上未出版的《雲水集》,也共七本。從質量來講,他的詩歌不如以前,我就選得更嚴一些。《政治諷刺詩》、《煤煙和鳥》就沒有選上一首。而《春鶯頌》也成了我選他的開國後的一個藍本。這七本我共選了五十首。這樣,解放前和開國後,共選一百八十首之多。<sup>⑤</sup>

可以看出,徐遲在實際的編選過程中,一面扼腕歎息袁水拍的悲劇人生,“願他的靈魂平安”,一面又為老友的“喜劇”慶幸,因為“他的詩歌活下來了,還會長久地活下去,並且寫入文學史的”。<sup>⑥</sup>經過徐遲精挑細選,最終確定 180 首詩歌進入《袁水拍詩歌選》(與出版時的篇目有差別)。

袁鷹也接受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安排,參與到《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之中。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徐遲在武漢編選,袁鷹在北京編選,最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來完成最終的統編工作。<sup>⑦</sup>袁鷹的編選工作結束於 1984 年 9 月,他在編選過程中有自己對袁水拍這位老友의 深刻情感,以《詩人遠去詩常在——〈袁水拍詩歌選〉後記》作了記錄,載於《人物》1985 年第 2 期。為了給這篇文章作注,他在文章寫好後曾登門拜訪華君武,華君武憶及“除四害”時袁水拍生活的細節,重繪《袁水拍除四害》,<sup>⑧</sup>隨同袁鷹的文章刊載。這幅漫畫後來編入《袁水拍詩歌選》內,是華君武與袁水拍友情的見證。袁鷹選輯袁水拍詩歌篇目為 200 首,顯示出與徐遲的差異。在後記裡,袁鷹特別交待了文革前的文化部批判(波及袁水拍)和文革結束後的政治清理(袁水拍受衝擊),形成了對徐遲文字的

補充，畢竟徐遲在文革前就離開了北京的文化生活圈，相關細節袁鷹更清楚。他提及文革初期袁水拍的被整遭際和《人民文學》復刊的具體細節：

瘋狂的大風暴一起，中央宣傳部被肆意誣陷為“閻王殿”，部長們既成了“閻王”，處長們當然就是“判官”，概屬於打倒和揪鬥之列。這樣鬧了一陣，就信息杳然，聽說發配到賀蘭山下牧驢去了。某次牽驢歸來，驢不肯走，他就高聲吆喝：“快走！快走！”我聽到這則被當作笑話的“幹校軼事”時，只感到一股淒楚情味，依稀看到一個身穿破衣、手持短棍、架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的蹣跚身影。

……尤其當周恩來同志病篤、鄧小平同志受命主持中央工作時，黨中央決定恢復《人民文學》、《詩刊》等五種文藝刊物，水拍被任命為《人民文學》主編。一方面是小平同志有明確的批示，大意是《人民文學》應該恢復，但靠現在的文化部領導，辦好不容易。另一方面是江青、張春橋和他們卵翼下的文化部，竭力進行干擾和破壞。在這針鋒相對的尖銳矛盾中，主編是很不好當的。但是《人民文學》恢復的第一期上，仍然推出了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這篇小說，儘管限於當時歷史條件有許多不足和不妥，但卻以要把經濟搞上去和要整頓企業這樣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鮮明的傾向性的主題，振聳發聵，於萬馬齊喑中表達了黨中央正確的聲音和人民的意願。發表這樣的作品，主編是擔了風險的。<sup>⑤</sup>

如果辯證地和歷史地加以看待，袁鷹已經看到袁水拍也是當時政治運動的受害者。至於為人詬病（包括茅盾、何其芳等）的《人民文學》主編的罪責，袁鷹以理解的同情態度、設身處地地為詩人當時的尷尬處境著想，超越了同時代大部分人的眼界，重提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能夠在復刊後的《人民文學》問世，讓人看到了袁水拍性格背後的複雜性。

徐遲、袁鷹在《序》和《後記》中回顧老友袁水拍的生平時，均沒有提及他在文革期間的“自殺行為”。<sup>⑥</sup>逝去的歷史雖不容假設，但如果袁水拍在文革期間真的自殺身亡，今天我們的文學史對袁水拍的評價肯定是另一面孔。<sup>⑦</sup>後來的人生命運，正如他的海外友人們看到的，“卿本佳人，奈何從賊”，有惋惜有責備，但“更是深知其人的體諒”，<sup>⑧</sup>他的悲劇“也是某一類知識分子的共同悲劇”。<sup>⑨</sup>

《袁水拍詩歌選》最終選輯詩歌 198 首，徐遲、袁鷹的編選篇目的框架結構是這部詩歌選集定稿的基礎，也是研究界觀察徐遲、袁鷹在 1980 年代初期文學觀念、政治觀念的重要材料。《袁水拍詩歌選》相關詩歌篇目的來源分布，這裡予以簡單說明：

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人選詩歌，主要集中在《人民》（新詩社 1940 年 1 月，選錄 17 首）、《向日葵》（美學出版社 1943 年 5 月，選錄 12 首）<sup>⑩</sup>、《冬天，冬天》（遠方書店 1943 年 11 月，選錄 22 首）、《沸騰的歲月》（新群出版社 1947 年 4 月，選錄 38 首）、《馬凡陀的山歌》（生活書店 1946 年 10 月，選錄 23 首）、《馬凡陀的山歌（續集）》（生活書店 1948 年 6 月，選錄 22 首）、《解放山歌》（新群出版社 1949 年 6 月，選錄 8 首）七部詩集裡，考慮到有重疊的詩篇（《人民》與《向日葵》就有《不能歸他們》、《雨中的送葬》、《陸地上的船》、《祖國的憂鬱》、《悲歌》5 首重疊），實際選錄總數為 137 首。

人民共和國以來入選的詩歌，主要集中在《華沙·北京·維也納》（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年 11 月，選錄 17 首）<sup>⑪</sup>、《歌頌與詛咒》（作家出版社 1958 年 6 月，選錄 24 首）<sup>⑫</sup>、《煤煙和鳥》（新文藝出版社 1958 年 7 月，選錄 7 首）、《春鶯頌》（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年 9 月，選錄 17 首）<sup>⑬</sup>、《政治諷刺詩》（作家出版社 1964 年 11 月，選錄 1 首）、《雲水集》（文革前編訂，未出版，選錄 11 首），另有未入集詩歌 9 首。除去重疊的詩篇（《華沙·北京·維也納》、《歌頌與詛咒》之間就有《“溫和派”艾契遜升官記》、《迎接巴黎世界和平大會》、《美國駐滬領事的請帖》、《黑暗的審判》、《可耻的失敗》、

《在西伯利亞火車中》、《兩個耳光》、《一幅崩潰的大廈裡》、《印度人民和朝鮮人民的擁抱》、《地球上各處的人都來到了維也納》、《阿根廷兒童說話》、《蘇丹青年》、《向偉大的和平戰士的英靈致敬》17首重疊；《煤煙和鳥》、《春鶯頌》之間就有《新的歷史今天從頭寫》、《紅色的戰鬥機群》、《我們要與時間賽跑》、《太陽鳥》、《青年女工》、《第3924輛汽車》、《資本的廢墟》7首重疊，實際選錄詩歌總數為61首。

徐遲在序言中說到，《詩四十首》和《春鶯頌》明顯帶有作家自選集的性質，是他編選過程中兩個重要的藍本。《詩四十首》主要針對的是“在解放前十年間（一九三九～一九四九年）所寫的一部分詩，選自過去出版過的幾本詩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騰的歲月》、《解放山歌》。從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八年，以‘馬凡陀’筆名發表的作品，不包括在這裡”。<sup>44</sup>《春鶯頌》是1958年起人民文學出版社建構的大型文藝叢書之一種，<sup>45</sup>主要是為十周年國慶獻禮，“是我從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到一九五九年夏季所寫的詩”，<sup>46</sup>所收錄的詩歌主要來自於《華沙·北京·維也納》、《歌頌與詛咒》、《煤煙和鳥》三種詩集。還有部分並沒有入集的詩歌，應該指的《雲水集》，和晚年創作的幾首詩。《春鶯頌》收錄詩歌總計為47首，編選到《袁水拍詩歌選》中的17首，佔三分之一強的比重，但與這三種詩集詩歌的篇目總量相比，還是顯得非常少。

從詩歌選的正式出版篇目來看，袁水拍1949年10月前的詩歌總計為137首（來自六部詩集），此後的詩歌入選61首（來自七部詩集）。以詩人的創作生涯來衡量，1949年10月後袁水拍的詩歌創作並不少，但兩位編選者都對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這些詩歌表達出不滿，“他已不再是一個唱諧謔調的山歌歌手，更談不上作一個熱情奔放的抒情詩人。他只能寫一點淡而無味的政治諷刺詩，說教式的論說文”<sup>47</sup>、“難以避免知識分子的某些弱點，並且不能逃脫由於歷史和社會種種原因形成的對知識分子的厄運”。<sup>48</sup>文革後至逝世前，袁水拍的詩歌發表數量不多（筆者統計，共7首），兩位編選者對這些詩歌的態度並不一致：徐遲認為“不如早期的詩歌那樣生氣勃勃”，<sup>49</sup>袁鷹則認為“這些詩歌在藝術上可能不及中年時期那些享有盛譽的力作，更說不上是他一生詩歌創作的峰巔，但也許算得上一首雄壯的交響曲中一個和諧的休止符”。<sup>50</sup>從這個細節性評價來推斷，編入詩歌選內的1982年公開發表的7首詩歌，顯然是袁鷹的編選意見。這也讓人看出：袁鷹試圖體現出袁水拍詩歌創作的內在線索，“從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體上總是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的”。<sup>51</sup>值得注意的細節是，袁水拍的兩首特殊的詩歌《搖頭》、《官僚架子滾開！》亦列入。《搖頭》發表於《人民日報》1957年4月18日，是鳴放時期很有代表性的詩歌。《官僚架子滾開！》發表於《人民日報》1957年5月10日，針對當時的官僚主義作了辛辣的諷刺。其實，《官僚架子滾開！》是有創作背景的，它是對曾經轟動一時的“左葉事件”的諷刺，差點讓袁水拍“跌入‘右派’深淵”。<sup>52</sup>這兩首詩的入選，編者（更主要的編選意願顯然來自於袁鷹）的意圖很明顯，試圖讓讀者看到袁水拍諷刺詩歌寫作的內在脈絡和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曇花一現。

應指出的是，《袁水拍詩歌選》的出版可以看作是袁水拍的老友們為詩人文學正名的一次集體行為，“為選集出版盡力者均係作者生前好友”，<sup>53</sup>徐遲、袁鷹承擔的具體編選工作最為繁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老友們的名字響亮地結集在這部書內，不僅有徐遲飽含深情的《序》、袁鷹傾訴真誠情誼的《後記》，還有郁風參與設計的書籍封面（向日葵），丁聰為詩歌繪制的插圖五幅（《大人物狂歡曲》、《主人要辭職》、《藝術家的難題》、《民國三十五年的回顧和民國三十六年的展望》、《萬稅》）。書前的插頁顯然經過精心篩選，除了作者本人的家庭生活與創作相關圖片，還選輯了袁水拍與友人的合影圖片三幀，分別是《作者與艾青、力揚在北京》（1949年）、《作者與徐遲在北京》



(1975年)、《作者與袁鷹、方成在北京》(1960年)。華君武刻畫袁水拍生活細節的漫畫《袁水拍除四害》,亦收錄其中。郁風1940年為《人民》出版設計的封面,放置在書前的插頁裡。

面對袁水拍這樣一位在政治上有瑕疵的詩人,徐遲、袁鷹、郁風、華君武等詩人的生前好友在1980年代初期開明的政治態度,顯然值得研究界好好反思。《袁水拍詩歌選》出版的背後,參與編選過程的人們突破的不僅是對袁水拍詩歌歷史的史料立體呈現,更是一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思想觀念突破的特殊標誌。在1980年代以來的思想與文化中,這仍舊留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留下一定的反思空間。

## 結束語

1976年11月28日,身處文壇邊緣的詩人穆旦在給巴金的信劄中提到袁水拍,“聽說袁水拍正在挨批,因為他是文化部副部長。大概為‘四人幫’污染了,很可惜”。<sup>54</sup>“很可惜”這三個字,表達出穆旦對袁水拍(詩歌)文學才華的惋惜之情。袁水拍希望自己的文學創作能面世,這從1980年4月8日給劉嵐山的信劄可看出。<sup>55</sup>1976年10月至1982年1月前的特殊政治語境下,未作政治定論的袁水拍想要發表自己的作品何其艱難,可能他的文稿轉給的不僅僅是劉嵐山這樣信任自己的摯友。遲至1982年3月10日,第3期《詩刊》刊登了他的《漢俳學步》組詩。這是袁水拍的名字在文革結束後的首次詩壇亮相,離上一次公開發表作品間隔時間長達六年之久。他參加的第一場公開的文藝活動,應為1982年1月14日《詩刊》編輯部舉辦的《詩刊》創刊二十五周年紀念會,徐遲看到的袁水拍是“一個疾病纏身、異常頹廢的老人”。<sup>56</sup>1982年4月上海《新民晚報》復刊時,趙超構曾經給袁水拍熱情地覆信和約稿。<sup>57</sup>這對於處於特殊的政治困境中文學作品發表艱難的袁水拍來說,無異於是一種特殊的情感期待。

徐遲在編選《袁水拍詩歌選》的過程中,欲言又止的語氣裡飽含對老友人生命運的感慨:既有痛恨,更有惋惜。他說,“詩人要桂冠,勿要烏紗帽”,<sup>58</sup>表達的依舊是袁水拍晚年的政治失誤,但他看到了袁水拍在中國新詩史中的貢獻。《袁水拍詩歌選》因體量的限制最終舍棄了譯詩,徐遲希望“也許將來可以另編一本譯詩集”。<sup>59</sup>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籌劃並出版“詩苑譯林”叢書時,徐遲向主持者彭燕郊建議“可以出一本袁水拍的譯詩”,但彭燕郊“當時不便答應。‘文革’才過去沒好久呢”。<sup>60</sup>這也從側面讓人看出,1979年9月《中國新詩選(1919-1949)》重版時,臧克家內心的緊張是很正常的。雖然彭燕郊沒有答應徐遲的請求,但徐遲仍未放棄努力,1984年第3期《外國文學研究》提前刊出《袁水拍譯〈聶魯達詩文選〉再版序》,曾這樣談到袁水拍翻譯聶魯達詩歌的特殊意義:“這次湖南人民出版社《詩苑譯林》收入並重印的這本書,原來只有九首詩,現補入發表於五十年《詩刊》創刊號上袁譯的一首《國際縱隊來到馬德里》,共得十首。這十首詩是奈魯達的代表作,是詩中之詩,是不朽的名篇。譯者雖是從英文轉譯它們的,但是,眾所周知,詩只能由詩人翻譯,所以袁譯的這些詩確是能保存原詩詩味的珍品。”儘管這個出版計劃最終夭折,但研究界仍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徐遲對袁水拍的特殊友情,那種深情蘊含在翻檢袁水拍譯詩篇目的過程中。

《新文學史料》曾於1992年第4期、2002年第2期分別刊載劉嵐山的《我和袁水拍》和一組袁水拍專輯<sup>61</sup>等文章,這背後離不開該刊時任主編牛漢的助推。劉嵐山在回憶錄中曾提及,“牛漢囑我寫寫袁水拍”。今天來看,對待袁水拍這位複雜的詩人,如果僅僅停留在所謂的“四人幫”文人集團的政治視野與學術框架裡,以政治的眼光來回避對他的中國現當代詩歌創作現象的研究,這只能證明研究者還停留在淺層的現象描述上。但是,到底該如何把捉並展開論述,顯然需要智慧,畢竟

在研究時也不能回避袁水拍在文革後期陷入到幫派文人的怪圈裡這一基本事實。

由《袁水拍詩歌選》編選的這一歷史經歷和此後《新文學史料》對袁水拍紀念的編輯行為來看，當代文學面對袁水拍這樣的人（包括臧克家、姚雪垠、浩然、汪曾祺等）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行為與寫作的學術研究時，的確需要一種智慧的學術眼光和態度，才能更好地理解與評判他們當時複雜的文化選擇。

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北京：新華書店，1950 年，第 51 頁。

②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3 年，第 298~303 頁；《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年，第 370-373 頁；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年，第 106~110 頁。

③政治諷刺詩是 1950 年部定教學大綱（老舍、王瑤、李何林、蔡儀四人共同斟酌形成）中羅列的必須講解內容。《〈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王瑤全集 7》，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60 頁。

④何其芳：《何其芳全集 8》，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8~79 頁。

⑤⑥⑬劉錫成：《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7、53、143 頁。

⑦另兩篇是《議“薄霧濃雲愁永晝”》（《文學報》第 56 期，1982 年 4 月 22 日）和《古代短篇〈換席記〉》（《解放日報》，1982 年 6 月 20 日）。此外，香港《大公報》先後刊載了《緊箍咒與金箍咒》（雜感，1982 年 6 月 5 日）、《文部省修辭學發凡》（詩配畫，1982 年 8 月 12 日）、《課長申辯增廣》（詩歌，1982 年 8 月 15 日）、《教科書歌》（詩歌，1982 年 8 月 20 日）、《今文觀止：文官武辯記》（詩歌，1982 年 8 月 23 日）和《參拜神社——仿魯迅諧體》（詩歌，1982 年 9 月 1 日）六篇文章。這與老朋友費彝民（香港《大公報》社社長）的關懷有密切的關係。譚廠：《袁水拍二三事》，北京：《新文學史料》，2004 年第 2 期。

⑧臧克家：《關於編選工作的幾點說明》，《中國新詩選 1919-194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 年，第 312 頁。

⑨臧克家：《“五四”以來中國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

（代序）》，北京：《文藝學習》，1955 年第 2 期。

⑩臧克家：《馬凡陀的山歌》，北京：《讀書月報》，1955 年第 4 期。

⑪臧克家：《新版後記》，《中國新詩選 1919-194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 年，第 336 頁。

⑫袁洪權：《〈中國新詩選 1919-1949〉的版本、編選與代序修訂》，上海：《現代中文學刊》，2014 年第 5 期。

⑬臧克家：《“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代序）》，《中國新詩選（1919-194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 年，第 21 頁。

⑭如臧克家曾在 1975、1976 年寫了一些批判鄧小平的詩歌，儘管是政治安排下的表態文字。但文革結束後特別是鄧復出後，臧克家的政治敏感度還是挺高的。

⑮⑯葉遙：《懷念袁水拍》，北京：《新文學史料》，2002 年第 3 期。

⑰袁光熙：《憶壽哥》，北京：《新文學史料》，2004 年第 2 期。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呂啟祥：《詩人的隕落——我所認識的袁水拍》，《紅樓夢會心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 488、482、489、486、491 頁。

㉞原文如下：“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著名詩人袁水拍，因患肺間質纖維化病，久治無效，於 1982 年 10 月 29 日逝世，享年 66 歲。”陳無言：《詩人袁水拍逝世》，韓麗梅編：《袁水拍研究資料》，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 年，第 150~151 頁。

㉟分為《文學運動史料選》、《短篇小說選》、《新詩選》、《散文選》、《獨幕劇選》等五種。這套書是在教育部領導下編選的，編出初稿後曾委託編選組召集部分高校教師和有關單位的研究員進行審稿，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政治當局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相關態度。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徐遜：《談袁水拍的詩歌》，北京：

- 《讀書》，1984年第11期。
- ②張寶林：《晚年的懺悔——袁水拍書信兩劄》，北京：《縱橫》，2011年第9期。
- ③精裝本印數1,180冊，定價5.3元；平裝本印數9,400冊，定價3.15元。
- ④這則推介語還以《介紹〈袁水拍詩歌選〉》的題目，出現在內部出版物《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1986年第3期上，不過出現了作者的錯誤署名，變成了“劉蘭芳”。
- ⑤⑥⑦劉嵐山：《我和袁水拍——兼悼趙超構先生》，北京：《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4期。
- ⑧馮亦代：《哭徐遲》，上海：《收穫》，1997年第2期。
- ⑨邵燕祥：《純粹的詩人》，鄧志偉編：《永遠的徐遲》，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年，第44頁。
- ⑩⑪黎辛：《袁水拍的悲劇》，北京：《書摘》，1999年第10期。
- ⑫王毅仁：《華君武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7頁。
- ⑬⑭⑮⑯⑰袁鷹：《詩人遠去詩常在——〈袁水拍詩歌選〉後記》，北京：《人物》，1985年第2期。
- ⑱與《人民》有5首詩歌重合。
- ⑲與《解放山歌》重合的詩歌有1首。
- ⑳與《華沙·北京·維也納》重合的詩歌17首。
- ㉑與詩集《煤煙和鳥》重合的詩歌共7首。
- ㉒袁水拍：《附白》，《詩四十首》，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第148頁。
- ㉓據筆者查看的這套書出版情況，約60多種文學書

籍包涵其中，作家分為老中青三個梯隊，代表性的老作家有郭沫若、巴金、老舍、田漢、曹禺等。

- ㉔袁水拍：《後記》，《春鶯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91頁。
- ㉕葉遙：《袁水拍和毛澤東》，北京：《新文學史料》，2004年第2期。
- ㉖穆旦：《穆旦詩文集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165頁。
- ㉗袁水拍在信劄中有這樣的文字：“附奉稿子兩頁，想隱去我姓名，任意加一假名，送給外地或本市的報紙副刊，試試投稿。你有相熟的編者嗎？不用，不必退。只要保守秘密就行。”劉嵐山：《我和袁水拍——兼悼趙超構先生》，北京：《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4期。
- ㉘彭燕郊口述、易彬整理：《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談話錄》，廣西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136頁。
- ㉙刊載的文章包括袁水拍的《論詩歌中的態度——給臧克家兄的一封信》、葉遙的《袁水拍和毛澤東》、袁光熙的《憶壽哥》、諤廠的《袁水拍二三事》、麗梅的《袁水拍筆名箋注》、韓麗梅的《一位山歌作者的足跡》。

作者簡介：袁洪權，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文學·教育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貴陽 550025

[責任編輯 桑海]